

## 影评: 闯入者

高志鹏, 约克大学

王小帅导演, 电影“闯入者”. 中国: 北京冬春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银润传媒、合润传媒、安乐(北京)电影发行有限公司、引力影视投资有限公司、重庆电影集团制片, 2014年. 110分钟.

“闯入者”是由王小帅导演, 于2014年上映的一部电影。欣赏这部电影的观众首先被带入到骚扰电话、跟踪、盗窃、杀人、闹鬼等一系列悬疑事件当中, 之后随着真相慢慢展开, 观众们才发现, 原来这部电影是在讲述几十年前发生的三线建设(约1964–1980年)<sup>1</sup>留下的后遗症。而这个后遗症, 正如同英文标题 – Red Amnesia (红色健忘症) – 揭示的那样, 和记忆或者失忆有关。

邓美娟是一位七旬老人。虽然她有两个儿子, 但是在丧偶之后她选择了独居。自从最近接到“老赵”的死讯之后, 各种离奇事件开始陆续发生, 邓美娟也变得精神恍惚。她经常接到电话, 但是每次对方并不说话。自己的玻璃窗被飞来的砖头砸碎; 去儿子家吃饭, 儿子家门口被莫名其妙地堆满垃圾; 当地新闻还开始频繁报道盗窃和杀人事件。邓美娟好心地把一个无家可归的男孩带到自己家里休息, 可是一觉醒来之后, 却发现这个男孩已经消失不见, 客厅里的老照片全部被撕碎了, 包括当年老赵的照片。邓美娟怀疑自己遇上鬼了, 她觉得所有神秘事件其实是老赵的鬼魂向她来“讨债”的手段。邓美娟古怪的想法在两个儿子的对话当中开始得到解释。小儿子并不知道老赵是谁, 他抱怨说一切都是母亲的臆想。他的哥哥揭开了谜团: 半个世纪前, 邓美娟和老赵的两个家庭都在三线建设的浪潮中迁徙到了偏远穷苦的贵州山区。三线建设结束之际, 为了竞争唯一一个可以返回北京的名额, 邓美娟通过写信给中央政府揭发老赵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暴力行为, 成功返回北京生下了她的第二个儿子。老赵则不得不留在贵州, 并且在严重的心理打击下瘫痪不起四十年, 直到近期去世。

心存内疚的邓美娟决定重访贵州, 向老赵的遗孀做出忏悔。抵达老赵家之后, 她惊讶地发现, 毁坏自己照片的那个神秘男孩, 原来是老赵的孙子。这个男孩在爷爷去世之后, 离家出走去了北京, 通过入室盗窃来生存, 并且在被房主发现的时候杀害了对方。之前的骚扰电话、砖头和垃圾也是这个男孩的所做所为。邓美娟同时发现北京的警方已经抵达贵州来缉

---

<sup>1</sup>三线建设是一场出于军事目的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在共产党的号召下, 几百万人口迁徙到西北和西南省份里支援建设。

拿男孩。出于内疚，她匆忙跑到老赵家报信，得到消息的男孩在逃跑的过程中不慎坠楼。

这部电影展示了两个家庭纠缠交错的记忆传承。正如英文标题 *Red Amnesia* 暗示的那样，邓美娟多年来一直在试图忘记自己当年自私的举动。偶尔听到老人们合唱革命歌曲时，她会仓皇逃走，似乎被自己当年把青春奉献给国家的记忆刺痛。她在家族历史当中悄悄撕下了自己不光彩的一页，因此小儿子完全不知道自己生活在北京的幸运从哪里来。相比较之下，悲剧的记忆在老赵家的穷困和疾病当中得到传承：老赵的孙子背负了整个家族的痛苦，离家出走寻找仇人，最终走上了犯罪和自我毁灭的道路。老赵孙子的闯入唤醒了邓美娟家庭压抑的记忆，促使邓美娟踏上了贵州的忏悔之行。

记忆的传承与断裂并不能仅仅通过个人得失的心理状态来解释。在更广的层面上，两个家族的生活轨迹被中国巨大的社会变迁所塑造，进而影响到个人对记忆的诠释。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中国进行了经济改革，一些城市迅速变得富有，也出现了思想的多元化。在北京，邓美娟的大儿子是一个成家生子的商人，小儿子看起来没有固定工作，跟男朋友生活在一起。邓美娟生活得并不开心：她带着传统的家庭观念来干预大儿子一家的生活，因此和儿媳频繁产生矛盾；她更时时刻刻为小儿子的同性恋取向而烦恼。现代化的城市生活与邓美娟对于革命年代的记忆格格不入，让她感到被孤立。于是，邓美娟选择了空虚的独居生活。只有面对丈夫的遗像，她才能够敞开心扉诉说自己的苦衷。四十年来贵州偏远的农村则没有发生大的变化，老赵瘫痪在床，老赵的妻子要肩负起照顾病人、养活整个家庭的重担，老赵的儿子则发誓要去北京杀了仇人一家。当邓美娟第一次把神秘男孩带到家里时，她曾经问他：“像你这么大，正是学习考大学的时候吧？”她自然没有想到，这个孩子没能够考大学，其原因恰恰是自己深藏在记忆中的那一段往事。贫穷、病痛、被剥夺的社会机遇，以及生活的虚无，这些苦难是老赵家每时每刻面对的现实，它们逼迫老赵的家族去记忆，而无法遗忘。

当儿子们抚慰邓美娟，说这个世界上没有鬼的时候，邓美娟回答：“你爸爸每天都能跟我说话，你怎么知道老赵就不能变成鬼魂？”也许可以这样理解：鬼魂即是活着的记忆。观众们可以看到，邓美娟丈夫的“鬼魂”存在于饭桌前的遗像里，在邓美娟失神自语的片刻。老赵的“鬼魂”虽然没有直接显示在荧屏上，但是它一直作为暗线推动剧情发展。它游荡在病榻，在破旧的老房，在贵州偏远的乡村，在孙子离家出走的路上，在没有应答的骚扰电话，在警察追逼下坠楼的一瞬间。它困扰着两个家庭，

使加害者和受害者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它从三线建设的阴影里升起，在中国社会巨变的进程中徘徊，时而隐晦，时而分明。

高志□, “影□ 闯入者.” *Oral History Forum d'histoire orale* 37 (2017), Special Issue on Generations and Memory: Continuity and Change.